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给中央领导人讲课 大讲 堂

周叶中：1200多场法制讲座的背后
许崇德：见证中国宪政发展进程
黄宗良：在最高讲台上畅言中共执政
卢先福：权威解读「执政」白皮书中的「第一次」
景天魁：探索社会和谐奥秘
李培林：深度透视和谐中国
张启华：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余 玮 吴志菲◎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叶南海

大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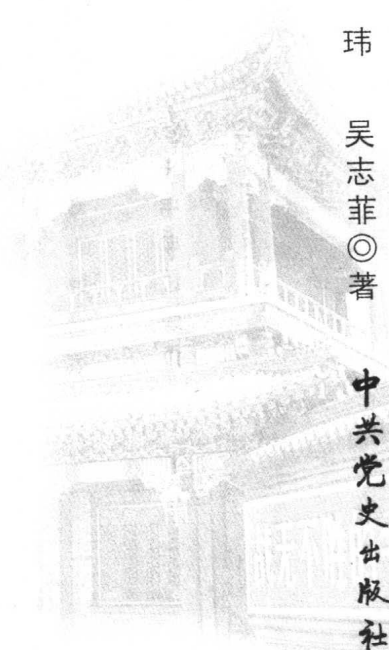
给中央领导人讲课



余
玮

吴志菲◎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目 录



1. 黄宗良:在最高讲台上畅言中共执政 1
- 在最高讲台上同中国领导人畅谈敏感话题 3
 - 对“政治”情有独钟并“白头到老” 9
 - 为构筑反腐防腐的“防火墙”献计献策 15
 - 抛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难题的“锦囊妙计” 19



2. 卢先福:权威解读“执政”白皮书中的“第一次” 23
- 40 分钟:满腹经纶吐露学界最新探索 26
 - 1.7 万字:赫赫树起中共“执政”里程碑 29
 - 20 多场:权威解读治国思路和理政方略中的“第一次” 33
 - 六本书:写照“光环”背后的偶然与必然 38



3. 景天魁:探索社会和谐的奥秘 43
- 矛盾的解决,需要“和谐”的引领。和谐社会问题研究专家坦言,社会学的春天来了,并推测建立和谐社会机制至少需要 20 年 45
 - 解决中国社会的民生大问题正当其时,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专家建言,应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形成一套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 48

- “和谐”与“好奇”早已成为这位社科院“黄埔一期”研究生学术骨子里的“基因”，在命运与时代的起落中寻思和谐的人生之旅 52
- 劳动起点论、社会认识系统、时空压缩、整体协调与和谐的发展观，……一个个理论和概念兼容与贯通着这位社会学家一辈子的学术研究 56



- 4. 李培林：深度透视和谐中国 61
- 述说和谐社会从“一句话”到“一篇大文章” 63
- 解读国家发展战略重大调整 67
- 与中央领导交流和谐社会构建方略 72
- 做学问要耐得住枯燥与寂寞 75
- 深入实际蹲点调研了解国情 77
- 从洞察生活变迁中获得真正的知识和学问 81
- 久违的文学梦与难了的经邦济世情 83



- 5. 张启华：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87
- 对党史工作意义的理解 89
- 学术上的独特研究 91
- 甘于坐“冷板凳”的情结 104



- 6. 陈雪薇：透过党史看治国理政 111
- 数易其稿，两次试讲，连语调高低、语速快慢、语言风格都有建议或要求。老教授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带着讲稿步入中南海 113
- 准确、简练的讲解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共鸣，他们不时地在讲稿上勾勾画画，现场气氛非常之好，大家就有关问题讨论了 75 分钟 115
- 细说中共领导人对“两大基本问题”的历史性贡献，如何创造性地回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尖端性的难题 118

- “红色之旅”上,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抄一路、学一路。

视教书育人为天职,谈吐中凸现大家风采与平民本色 123



7. 蔡 昉:打“阵地战”的“穷人经济学家” 127

- 细述建设中国式反哺农业的时机与着力点 129
- “文革”知青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 132
- 从大学时代的“生吞活剥”到智囊机构的“行万里路” 135
- 农业保护政策的反对者终究成为农业经济学家 138
- 深层透视“人口红利”与“就业优先” 142
- 打“阵地战”的“穷人经济学家”很富足 145



8. 傅立群:纵述新军事变革应对之策的智库将军 149

- 铁血将军脑际难以消弭的战场硝烟 151
- 在人生的另一个战场上同样是一位将军 156
- 智库学者揭密现实问题背后的热点 163
- 红色讲坛上纵述新军事变革应对之策 167
- 与“傅子”圆桌共话“两子”兵法的应用之道 173



9. 许崇德:见证中国宪政发展进程 179

- 站在给中央领导讲宪法的最高讲台上 181
- 揭开亲历 54 制宪全过程的密码箱 185
- 激情回忆现行宪法诞生历程 187
- 踩着时代的鼓点修宪 191
- 三次得到小平同志亲切会见 196
- 让法治的种子深入亿万人的心田 199



10. 周叶中:1200 多场法制讲座的背后 201

- 说法:红色讲坛上为中央领导首讲宪法 203
- 法力:为中央开风气之先叫好 205
- 法术:普法“播种机”的 1200 多场讲座打动大江南北 208
- 法宝:年轻学者“三级跳”的奥秘所在 211

■ 法门:为了没有遗憾而付出的背后	213
■ 法眼:力主用“宪法思维”执政	216
附——法学界的“青年十杰”新鲜出炉	220



11. 侯祥麟:一生只写好一篇“论文” 223

■ 总理亲自点将,退居二线却开始了另一个“黄金时代”;一向舍小家顾大家的老人第一次对女儿大发雷霆	225
■ “决不能把石科院的牌子倒过来!”引“狼”入室破怪圈,盛开的“金花”结束国人用“洋油”的历史	229
■ 少年萌生救国志,一堂普通的化学课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当年的“红色战士”终成“黑石油”的提炼大师	233
■ 视“美差”为政治任务,身处异乡的他,那颗火热的心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祖国,“红色科学家”将生命与祖国石化事业紧密相连	236
■ 好下“闲棋”的他发起成立我国首个工程技术国家队学术机构,主倡节约型社会的建立——石化史册上重大决策后面都有同一个名字	239
■ 其实,有憾无悔的他,自己的人生就是一篇绝好的大论文;“大手大脚”的他对自己却“抠”得要命,一生追求奉献的他也欠“债”不少	244



12. 林毅夫:为强国富民献心智的红墙高参 249

■ 明星军官特有的北大情缘	251
■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关门弟子意在为强国富民献心智	254
■ 在“比较优势”中把握中国经济的社会脉搏	259
■ 农业问题专家纵论“农村包围城市”	264
■ 中国发展战略问题的战略眼光	268



13. 胡鞍钢:穿梭在决策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 275

■ 13亿中国人民是自己的最大靠山	277
■ 研究发展的可持续性却忘了自己的可持续性	280
■ 需要就是理由,就是发展空间	283
■ “鞍钢”是这样炼成的	286
■ 目光从未离开普通民众	287



14 樊 纲·经济世界中求证人生价值	293
■ “名人鸣言”道破宏观经济天机	295
■ “右派子弟”·农村社员·经济情结	297
■ 高强度、高浓缩的思想“炼狱”	301
■ 以自己特有的“比较优势”静观世界	304
■ “奇谈怪论”为“中国问题”号脉	308

1. 黄宗良

在最高讲台上 畅言中共执政

这位出入中南海的高层智囊,着眼于全球大背景和世界大视野观察、思考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走向,主张通过深入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及其经验教训,为审视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镜鉴。他以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做人和作文相一致,作为自己在学风和文风方面的努力方向。

黄宗良：在最高讲台上畅言中共执政



■黄宗良档案盘点：

黄宗良，著名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家。1940年3月出生于广东潮安，196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

专门研究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十六届四中全会,2004年9月在北京召开。黄宗良表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共根据新世纪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全会研究解决党的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会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其实,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上一届中央高层就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有所筹划。十六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高层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十六届四中全会前的一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报告,让黄宗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通过 CCTV“新闻联播”及新华社电讯通稿的发布,黄宗良一夜闻名。早在 1987 年底,十三大召开前,不到 50 岁的黄宗良就作为党内民主小组成员参加过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为期两个多月时间,与其他学者、专家等共同形成了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构想。

黄宗良操一口标准的广东普通话,尽管记者听得比较清楚,但他总担心别人误解,不时地用笔在纸上辅助着解释。记者不免为他的认真、严谨而心动。采访不时被电话、来访客人打断,以至整个采访进行了整整四个小时。记者离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办公大楼时已是人去楼空,街道华灯初上,然而黄宗良接受专访的情景还在脑海中回放……

■在最高讲台上同中国领导人畅谈敏感话题

2004年6月29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据了解,这是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与国家机关相关部委负责人70多人聚集中南海怀仁堂。“执政能力”曾经是党建理论的敏感话题之一,黄宗良没有想到自己和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卢先福以学者身份走进中南海,和中共领导人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早在2002年黄宗良就提出了执政党需要认识执政规律,并从历史角度系统总结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在理论界和政界产生

了较大影响。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思想,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前被探讨多次,学界人士将之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真正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转变。“执政”一词在中国政治话语中淡出多年之后,再次被高层领导人频繁提及。江泽民在“5·31”讲话中,一个核心表述便是“执政为民”;中共新的领导层继续探讨执政能力。

执政党对执政能力的追求,不仅仅停留在意识上、观念上,它还涉及党的执政方式、领导体制、组织方式、党与国家关系等非常广泛的层面上。因此,在建党83周年前夕的这次中共集体学习极为引人注目。观察人士认为,这次集体学习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将成为中共下一阶段的一个工作重点。

黄宗良回忆说,这次集体学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在主持学习时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胡锦涛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深入分析和研究党执政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集体学习自下午3时开始,5时多结束。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黄宗良首先作了1个小时的讲解,随后卢先福作了40分讲解,二人还谈了自己的研究体会。黄宗良介绍的是国外共产党和其他类型政党的执政经验和特点,卢先福讲解的是中共对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启示,以及理论界对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体会与建议。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执政能力问题展开了讨论。

黄宗良谈到,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它不是为一个狭隘的阶层服务。这个宗旨不能变,离开了这个宗旨,共产党执政就会失去基础。但在执政方法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有其经验与特点值得借鉴。当代社会,沟通交流越来越多,人类文明的共同性越来越多,执政党面临很多共同的情况,需要互相借鉴经验。黄宗良说:“苏联东



黄宗良主编的作品大多成为大学政治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欧国家共产党丧权亡党，甚至人头落地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出自一个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苏联建党模式，他们是怎么丧权亡党的，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事实上，苏东剧变一开始，中共就非常敏锐，组织理论工作者观察研究，2001年，中共党建专家黄苇町曾撰文《苏共亡党十年祭》，此文很快便被列为党建理论教材。黄宗良将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归结为5个方面——

首先是理论创新问题。苏东共产党丧权亡党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教条主义禁锢了理论创新，理论没有跟着实践发展，几十年一贯制。表面上看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实际上脱离了现实，阵地就很难守得住。“比如苏共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提法就用了半个多世纪，没有根据资本主义的新情况及时调整，对人民群众缺乏说服力。再比如，直到苏共解散为止，他们一直讲：‘在苏联，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实际上正是民族问题解决不当导致了苏联最终解体。”

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第二个经验教训是发展经济问题。国强民富是民众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经济停滞,不发展,人民就会失去信心。黄宗良说,共产党执政期间,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取得巨大成就,卫星上天,国力雄厚。但是由于重工轻农、重重轻工、重军用轻民用、重积累轻消费,人民群众没有从发展中得到应有的好处,为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埋下伏笔。今天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比如,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在最近访华时反复讲:“没有比经济工作更重要的工作。”

干部和领导体制出了问题,是外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黄宗良认为,干部问题的核心是要用民主的办法培养、选拔干部。“党内民主是保证党的凝聚力和活力的先决条件,以人治为基础的干部选拔制度是群众对党组织不信任的根源。苏联剧变前夕,对苏联公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苏共拥有1800万党员,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时,几乎没有人以实际行动表示反对,普通党员在执政时期没有发言权,在丧权亡党之际自然不会为这个政党奔走呼号。

苏东各党的党内民主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党内始终没有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处理党政关系问题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也很严重。黄宗良对干部队伍和领导体制问题的体会是,如果党内不能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罢免,就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权阶层,党一旦成为特权利益的代表,就会失去执政基础。

国外共产党执政教训的又一个方面是如何处理各种矛盾的问题。如果缺乏危机处理能力,不注意妥善解决矛盾,以为依靠强压就能够长治久安,就会酿成灾难性后果。而党内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党的领导人缺乏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苏东剧变中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事件,政局已经非常不稳,党的领导人却得不到任何信号,仍然正常出访、休假,不能在事态的萌芽阶段果断处理好危机。“苏联的国家专政机器不可谓不完善,但从历史演进过程看,高压和缺乏政治警觉性都不能维持长治久安。”



中共中央企业机关工委约请他到外地讲课，本来都忙得一塌糊涂的黄宗良爽快地答应下来

让黄宗良感动的是，中央高层领导在下边认真、诚恳地听。采访中，他回忆说：“尽管每人手中都有早已印发的讲稿，我有时看稿有时不看稿，在讲述时发现每当我翻到讲稿的下一页时，听到与会者都齐刷刷地翻阅下页。可见，中央领导决不是在走形式，而是实实在在地学习。”在讲解中，黄宗良还发现一个小“细节”，当天的集体学习，领导人到会很整齐、准时。起初，他还有些误解，一是吴邦国和温家宝同志在自己讲解完后就急匆匆地离开了会场，毕竟后面还有卢先福的讲解——黄宗良还以为是中央领导认为自己没讲解好，不值得细听，不由得自责起来；二是中共中央常委曾庆红和李长春同志没到现场。

第二天，黄宗良从有关报纸的报道得知：吴邦国和温家宝“早退”是因为还有其他的重要国务活动要参加，没想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在一点点空暇中还抽身学习；另外，曾庆红和李长春同志当时出访在外，因此没能参与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两个压在心头的疑问化解后，黄宗良轻松之余有些激动：“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干事业的班子，不是做样子，搞形式，是一个求真务实的领导集体。”

是的,中央高层开诚布公,号召研究、借鉴其他政党的执政经验和特点,并身体力行,与学者一起共同学习探讨执政能力问题,本身就显示中共执政作风的转变。

集体学习之后,胡锦涛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充分利用所面临的难得机遇、正确应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从而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都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坚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抓紧解决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黄宗良是6月8日接到学校党委通知的。通知他将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请他做好准备工作。此前,中央有关部门曾搜集过他的学术简历等有关个人资料,没想到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黄宗良这次能站在中南海的讲台上。对此,黄宗良幽默地说:“可能是自己一向对自己的学生太严了,一年到头又是面试考生,又是论文答辩,这回是个报应,也让我品味一下当学生的滋味,让中央高层组成的特殊‘答辩会’来让我‘答辩’吧。我只有面对现实,迎难而上。”黄宗良想到的不是中央领导给自己当学生,想到的是自己作为学生来“答辩”,这种心态无不彰显出他的治学态度与为人本色。于是,他接受中办、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等部门的具体指导,开始了为期三个星期的准备,边起草边修改。“我还做了许多准备。全世界有5000多个政党,我不可能都知道,毕竟自己主要关注的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党情况。我琢磨他们会提什么问题,并在行政管理、统战、纪检、政法等方面也一一做了些准备,以便应对。”让黄宗良高兴的是,这次讲解得到了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承认,给与会者印象深刻,受到广泛的好评。据悉:这次集体学习后,相关资料也下发各省、部级单位,要求各单位一把手一同学习。

“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世界

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既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过程,也是不断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深入把握执政规律的过程。”胡锦涛在集体学习结束时的讲话,至今还回响在黄宗良耳畔,激励自己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学,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不断取得新认识、新成果,不断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

■对“政治”情有独钟并“白头到老”

黄宗良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生的。这个农家孩子不到7岁就在稻田里插秧,破竹编筐,放牛捕鱼,什么活都干。当年解放军南下的情景,他还记忆犹新。土改、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的运动,他都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渐渐地他对政治有些敏感。也许,自这个时候,他潜意识中萌发出今后学政治学的念头。

“我能够读书,能够出来,我得感谢父亲,是他坚持送我上学的。母亲反对把我送出去,说‘你把孩子送出去,我见不着’什么的。”在家里,黄宗良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家里贫困而父母曾将一个哥哥过继给他人。然而,尽管家里并不富足,受过苦的开明父亲深知只有读书才有出息,于是下决心送小儿子上学。今天,事业有成的黄宗良对父亲当年的选择感恩不尽。

“我们那时上大学,专业的确定和毕业后的工作分配上,基本上是‘包办婚姻’,‘先结婚,后恋爱’,且必须‘白头到老’。我对‘政治’,倒是情有独钟。”高中阶段,黄宗良的各门功课都不错,尤其是文科,特别是语文与政治课,成绩拔尖,学习的兴趣也特别浓厚。

高中毕业时,黄宗良的第一志愿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可是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而没能成行。于是,所报考的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录取了他。为此,黄宗良才真正与社会主义政治学结缘。本来就对政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到北大这个人文荟萃的著名学府,黄宗良宛若撞进了大观园,一切感到



黄宗良笑称，“政治”是自己的情人或第二个妻子，两个一样的重要，都将“白头到老”

新奇与惊喜。于是，他成了北京图书馆的常客，一头扎进了政治学广博的书海之中。

大学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的黄宗良学习劲头不减。“当时只知读书，没有同实际联系起来，认为党组织不会犯错误。”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到北京郊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黄宗良对北方农村有些感性的了解，在同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苦，“对于政治要为谁说话有一种感情上的培养”。

1965年7月作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首届毕业生毕业时，黄宗良特别想到某个地方去搞政策研究，学校却看中他的学习功底与专业兴趣，“强行”让他留校任教，从事国际共运史教学，后来又将专业逐步集中到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上。

在北京大学，黄宗良幸运地师从当代中国政治学奠基人赵宝煦（时任政治学系主任）。“赵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不是因为他说我好话，